

民国时期图书馆的妇女教育实践与影响*

宋美锦 姚乐野

摘要 民国时期,图书馆在妇女教育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理论上,民国学者从多角度指出图书馆与妇女教育的关系;在实践上,图书馆界通过建立妇女图书馆、保障妇女阅读条件、开展妇女教育等活动等措施,为妇女教育构建多元发展支撑。其对妇女教育的深刻影响在于:提供多样化知识和服务的同时,推动妇女解放;通过发展妇女教育,彰显并强化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由妇女教育指导儿童教育,在家庭中形成知识获取的代际传递;提升妇女的议事素养、职业技能与社交协调能力,支撑其有效参与社会。参考文献 80。

关键词 图书馆 妇女教育 社会教育 妇女解放

Practice and Impact of Women's Education in Librarie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Song Meijin Yao Leye

Abstract: Libraries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women's educatio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oretically, scholars of the time elucid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braries and women's educati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Practically, the library community constructe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support for women's education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establishing women's libraries, safeguarding women's reading conditions, and conducting women'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ts profound impact was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while providing diversified knowledge and services, it contributed to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s liberation; second, by developing women's education, it highlighted and strengthened the soci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libraries; third, it guided children's education through women's education, fostering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within families; fourth, it cultivated women's deliberative competence,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social coordination abilities, enabling their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society. 80 refs.

Keywords: Library; Women's Education; Social Education; Women's Liberation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剧烈转型的关键阶段,正所谓“妇女解放的程度,可以作为一般的解放之尺度”^[1],妇女解放作为重要的时代命题,深刻影响着国家发展的进程。而妇女的解放又与妇女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教育成为开启妇女心智、赋予其独立人格与社会参与能力的关键路径。

学界对民国时期妇女教育的研究,多聚焦于边区的乡村妇女教育^[2-4]、报刊媒介的影响^[5,6]或精英人物的妇女教育观^[7,8]等,却相对忽视了图书馆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刘国钧认为,图书

馆助力普及教育,图书馆社会教育在构建理想社会、培育民族精神方面有重要作用,因此倡导以图书教育推进文化发展^[9]。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基石性机构,为民众提供平等学习与终生学习的场域。妇女作为“民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受图书馆社会教育的影响。图书馆通过各类方式为妇女提供了接触新知、参与社会的指引,成为推动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的重要力量。

本文以民国时期图书馆的妇女教育为研究对象,通过查找相关史料,梳理民国时期学者对图书馆与妇女教育关系的观点,并从建立妇女图书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百年中国图书馆界国际交流史研究”(项目编号:22BTQ015)的研究成果。

馆、保障妇女阅读条件、开展妇女教育活动三方面详述民国图书馆为发展妇女教育进行的实践,就其影响进行剖析,旨在揭示图书馆在促进妇女教育乃至妇女解放中发挥的深刻作用与历史贡献。

1 民国时期学者对图书馆与妇女教育关系的观点

民国学者关于图书馆与妇女教育关系的探讨,是理解中国妇女教育发展进程的切入点之一。这些观点既体现了学者对性别平等与教育公平的探索,也助力了图书馆为妇女群体服务的实践。

1.1 图书馆对妇女教育重要性的相关观点

在民国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学者们把握并结合“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与“女性教育的发展”两个命题,赋予了图书馆在女性教育中肩负的重要使命。

首先,众多学者指出图书馆有助于直接对妇女进行家庭指导。颇为关注女性问题的杜定友提到,区别于学校的传统教育,面向民众的图书馆在继续教育上占据重要地位^[10],因而在图书馆中应该注重男女平等^[11]。他强调妇女与图书馆事业有特别的关系,一方面,女性作为母亲有指导儿童课外阅读的责任。妇女如果能引导孩子“到正式的图书馆,选择相当的图书”,那么对于教育而言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一般妇女的大部分时间都“费在无谓的消遣”上,如果她们“能够利用图书馆,与图书馆多发生一些关系,闲时多看一些修身益智的书”,那么对于家庭而言具有积极意义^[12]。关于这一点,陈友松等同样指出图书馆能够通过书籍借阅提供“家事教育”,从而“知道改良家政,提倡家庭副业”^[13]。此外,杨昭愬等翻译的著作中也提到图书馆对于家庭中的“养蜂法,种种关于园艺的问题,都有预备,供人采择”,使田间妇女能“感受到图书馆的便利”^[14]。

其次,亦有学者提及图书馆对妇女的科学启蒙作用。如蒋镜寰认为图书馆是“知识之源泉,

学术之宝库”,其使用者没有男女之分^[15]。他指出,普通民众缺乏科学的思想,几乎不知道科学是什么,因此图书馆还具有“学术介绍之责”,让具有“研究科学之兴趣”的妇女,都能“获得充分应用之常识”^[16]。使得“不问初受教育及已受教育者,咸得自动的、乐意的,继续阅读和研究之机会,从而获得高深的智识”^[17]。

1.2 妇女利用图书馆面临阻碍的相关观点

在阐扬图书馆对女性教育的重要性的同时,民国学者也敏锐地意识到妇女利用图书馆接受教育面临着主观和客观双重阻碍。

从主观因素来看,在性别意识和家事负担下,妇女群体自身普遍缺乏利用图书馆提升智识、指导生活的主动性。有观点指出“环境和天职”束缚了妇女,因有了丈夫和孩子,便渐渐和书本远离,在家政之余她们“也不肯把读书当作消遣”^[18]。梁启超也认为,包括妇女在内的广大普通民众“绝不感有图书馆之必要,纵有极完美的图书馆,也没有法儿请他们踏到馆的门限”^[19],指出了妇女群体不愿主动利用图书馆的困境。更是有女性读者提及图书馆里的女性太少而导致自己不敢去读书,因为“好像四周的男子要吞了我一般”^[20]。

从客观因素来看,即使部分妇女有通过图书馆接受教育的需求及意图,也因为封建家庭观念或社会现实条件而难以实现。张劲我发现,乐于读书的妇女有因此“而与家庭发生争执的”,也有“与家庭脱离关系的”,因为家庭将妇女读书看成是她们的“反抗”^[21]。徐旭以南宁的农妇为例,指出她们在平日极度操劳的情况下,晚上仍然抽空参加国民基础学校举办的读书会^[22],这也体现了部分妇女拥有较强的读书意愿。但他也明确认识到,我国的文盲比例多达80%以上,大多数人一点也享受不到图书馆带来的福利^[23]。

1.3 相关观点的理论指导作用

民国学者关于图书馆与妇女教育关系的辩证分析,论证了图书馆对妇女教育的意义,实际上形成了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准备,推动了对妇女教育的道德提倡部分转变为了相关的政策方针,其中既包括

政府颁布的《普及全国图书教育办法》等社会教育纲领,也包括中华图书馆协会等图书馆行业组织发布的宣言,还包括《浙江省立图书馆妇女读书会章程》等图书馆内部具体实施的条例。此外,学者们关注到妇女利用图书馆时面临的现实阻碍,这促使图书馆界在进行妇女教育实践时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服务机制,如提供与家庭生活相关的妇女读物,使其得以指导家事和育儿,从而缓解传统家庭中的角色冲突;再如注重文盲妇女与识字妇女的差异化,从而提供不同的教育指导方式等。

在理论的指导下,图书馆界对建立妇女图书馆、保障妇女阅读条件、开展妇女教育等活动等项目进行宣传、指导和实践,致力于多维度促进妇女群体利用图书馆资源接受教育。

2 民国时期图书馆开展妇女教育的实践

2.1 建立妇女图书馆

民国初期虽然各处图书馆林立,但“其服务目标,既不专对妇女,其存在与否,将与妇女无关,妇女之欲自修参考者,绝无可以利用之图书馆”^[24],因而各地出现了不少创建妇女图书馆的尝试,如天津和上海。

天津妇女协会成立于1928年9月11日^[25],在9月30日举行的常务会议上,首次提出创设天津妇女协会妇女图书馆^[26],将建立图书馆视为紧迫且重要的事业。但因“经费困难,募捐又苦于不及”,因此恳请天津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假400元以济目前急用”^[27]。10月31日,天津妇女协会教育委员会在第六次常务会议中报告称创办图书馆获得捐款800余元及修理费用80余元,修缮工作当日即可竣工,拟定11月10日开幕^[28],但后来又因为管理图书的主任抱病而推迟^[29],最终于1929年1月1日开幕。天津妇女协会图书馆最初有500种关于教育、政治、经济、文艺、社会等方面的通俗书籍^[30]。在开幕式的致辞中,天津妇女协会代表王文田女士强调“中国女子素约束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传统思想之下,故智识技能远不及男子,以致所处地位日低”,为了追求男女平等,利用妇女图书馆“一方面求得真实智

识,一方面从事革命运动,然后妇女始可达于真实解放之境”^[31]。可见,该图书馆的设立不仅是为了提供知识资源,更是为了成为打破思想禁锢、推动妇女解放的阵地。

作为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上海在建立妇女图书馆之事上也取得了较大成绩。上海妇女教育馆成立于1935年3月8日,“专以实施妇女教育,并研究实验妇女教育之理论及方法为宗旨”,强调男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平等,故“女子受教育之权利,应与男子平等”^[32]⁽¹⁾。其下属的妇女图书馆也于同日成立,可见创立图书馆一事深受重视。妇女图书馆专门搜集有关妇女的图书,多为妇女问题与家政、文艺及教育等,供给妇女阅览且可以借出^[33]。该馆的发展显著体现在资源数量上,在创立时拥有图书1297种、杂志762册^[32]⁽⁸⁾,到了1937年3月8日,图书已超过2500种,杂志也达到了1980册,还有90份图表^[34],这些资源成为其开展妇女教育坚实的物质基础。该馆亦注重理论的实际运用与创新,如馆内本来用的是杜定友所编的图书分类法,但因该馆性质和普通图书馆不同,从而自行进行了改编,并将其分为妇女类、语文类、教育类、社会类、自然类、艺术类、丛书类、参考类、杂志类^[35],通过重构分类框架,将“妇女的需要”置于核心位置。

此外,上海图书馆界喻友信、林重稚等人也曾尝试建立一所妇女图书馆。最初于1939年对外征集关于地址、图书征集方法、借阅等问题的意见^[36],市内的女青年会、妇女节约会等妇女团体都先后发函进行提议^[37]。受经费所限,无论是创立事宜、委员会成员,还是宣传工作等,多以“赞助”“帮助”为主要方式^[38]。在确定馆址后,仍将重心置于募捐^[39]。本拟于1940年6月开馆,但直到1941年3月8日仍未成功,有报道称因为“上海各文化团体筹备之儿童图书馆正在进行,此事与妇女亦有密切关系,故决于儿童图书馆成立后,再行开始推动,以免分歧”^[40],此后便未能再见有关此馆的信息。当然,在抗日战争中筹集经费、寻求赞助以创办图书馆实属不易,虽然最后未能成功,但也充分展现了图书馆界人士致力于提高妇女地位、提升其人生价值的深远期望。其创办妇女图书馆的目的是“妇女之继续增进其地

位,克尽其责任,参加各种社会事业”,甚至“无碍而与男子并肩争光”,从而获得“学识道德之修养,职业技能之提高”^[24],其计划的馆藏图书“均以实用为主,毫不涉及其他”^[41]。

2.2 保障妇女阅读条件

除专设的妇女图书馆外,众多普通图书馆亦通过设立专属阅览空间、配置针对性馆藏资源等措施,提升了妇女群体获取文献资源的便利性与可及性。

首先,民国妇女阅览室的设立可以追溯到较早时期。以湖南省内的各图书馆为例,湖南图书馆在1920年即提出“以促进进化起见,特于楼上新闢视线良好房屋一大间,作为女阅览室,以期女界阅览之便利”^[42];汉寿县立图书馆于1923年开馆时便已设置妇女阅览室,并有当年经费增加后再次扩充的预期^[43];1925年,湖南省教育会图书馆在请用庚款的陈述中指出,因“本馆妇女阅书者甚觉稀少”而“拟渐设妇女阅览室”^[44]。其次,妇女阅览室的设立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制度化特征。如1929年河北省立第一通俗图书馆因“办理得宜”,在学区扩充教育处的指令下分设妇女阅览室并增拨经费,以求扩展^[45]。陕西省教育厅更是将妇女阅览室纳入县级图书馆建设标准,明确要求县馆分设“妇女书报阅览室”,以达到“储存各种图书报章供一般民众阅览以改进生活常识及文化普及”的目标^[46]。

但是,仅靠妇女阅览室并不能吸引女性读者,它的持续运营与妇女读物是密切相关的。例如成都市立图书馆虽于1927年设置了妇女阅览室,却因“馆费奇绌,妇女书籍迄未增置一册,女宾以无书可览,亦难莅止”,为解决妇女读物资源短缺问题,“吴市长为该馆募捐赠书,王笑予馆长拟藉此机会,增益妇女书报,俾以充实妇女书部内容”,并提出向省内女性知识分子广为募捐,以“期溥利本市社会妇女,便能增益学识,助长能力”^[47]。

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配置妇女读物的必要性首先体现为男女阅览的差异,因女性“对于含有激烈性的喜剧或美术很感兴趣”,且“女性最热心社会服务,所以需要种种的参考图书,帮助她们设计或指示方法。女性喜读富于情感的小说,对于科学或发明有

兴趣的妇女倒不多见”^[48]。其次,各种关于政治、社会、科学、文艺的出版物都有宣扬文化、增进智识等作用,男女都可读,但“在现社会组织制度下,女子仍未获得与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而且男女间又毫未减少相互歧视的心理”,且妇女在生理上、习惯上有许多特点异于男性,则应该针对这些相异之处进行讨论和介绍。例如“怎样解决妇女在社会上或家庭间的一切困难;如何改善诸般枯燥无益的生活;指导妇女在家庭间一切繁重的工作;并供给一切正当娱乐材料”,从而“以家庭为单位,合而谋整个社会之福利”^[49]。

从理论层面看,专业学者在文献资源建设指导中较为重视妇女议题。杜定友在《普通图书馆图书选目》中将妇女问题和妇女教育列入重点书目类型,其推荐的图书包括《妇女法律常识》《妇女解放新论》《妇女与社会》《妇女生育论》等^[50]。从实践层面看,主要机构的馆藏建设亦充分体现了对妇女读物的系统收集。如东方图书馆内的图书类型包括妇女教育、家政学、男女礼仪、妇女地位及其待遇等^[51];苏州图书馆的图书目录中有《女性中心说》《女性论》《妇女之过去与将来》等大量与妇女问题相关的书籍^[52];浙江省图书馆将三八妇女节视为“全世界妇女努力奋斗之光荣纪念日,特提出有关妇女问题之图书多种,陈列阅览室,俾妇女界随时取阅”等^[53]。此外,即便是非正式、小规模的家庭文库,其倡导者也关注到妇女为家事所累,没有机会接受新文化,保存着不适时代的旧智识,从而呼吁通过家庭文库把“新知识、新思想运送到家庭中去”,如广西省立民众教育馆提出家庭文库中书籍的选择应侧重“家政、妇女问题、各项常识类的图书”并搭配杂志^[54]。由此可见,从图书馆学者的系统书目指导,到各地图书馆的馆藏建设,再到深入家庭的知识普及尝试,民国时期的图书馆界构建了较为立体的妇女知识供给体系。

2.3 开展妇女教育活动

图书馆虽设立妇女阅览室并配备妇女读物,但此类基础性保障并不能完全充分转化为妇女

的实际阅读行为。以安徽省的安庆图书馆为例,其女子阅览室虽位于新建的洋房内,但是却“终年也轻易看不见一个女子来阅书”^[55]。究其原因,在传统观念及性别规范的影响下,妇女普遍缺乏主动利用图书馆进行学习的意识。对此,图书馆除提供阅读空间与文献借阅外,更是主动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以吸引妇女参与。其中,妇女识字班与妇女读书会是最具代表性的活动形式。

妇女识字班可以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工作”^[56],因此被政府视作民众教育的重要环节,如北平市教育局曾面向社会发布《民众识字劝告书》,提到“妇女成人……写信既须求人,记账尤所不能”,从而要求学校、图书馆等单位“一律限期成立识字班”,重点指出“要提高女权,非识字有知识不成功”^[57]。

图书馆则承担起开办妇女识字班的具体职责,将识字运动落实到实践中。以天津市内的各通俗图书馆为例,第一通俗图书馆多次刊登妇女识字班的招生广告并指导多期学生顺利毕业,其宗旨是帮助“失学妇女认识普通应用文字”,招收18岁至40岁的女性学生。课程以识字为主,简单珠算为辅,学习时间为六个月,并颁发文凭^[58]。虽不收取学费,但课本、纸本、铅笔、石板、石笔等学习用品需自备^[59]。第四通俗图书馆指出,近数年来“虽教育逐渐发达,至妇女求学机会,仍甚缺乏”,天津市作为华北巨埠,市民的知识水平本应和城市发展相适应,但事实却相反,其中“妇女为尤甚,原因不外乎因经济拮据或时间机会之不许”。因此,天津市社会教育机关议决开办妇女识字班,“藉以逐渐减少妇女文盲”。其妇女识字班于1936年2月成立,旨在使“失学妇女能得求学之机会,因之知识充足,在家庭中能管理裕如,不感困苦,不致受骗,进而能于社会尽相当之义务,一举而数善备焉”^[60]。第六通俗图书馆“以造成失学妇女得识读应用文字,并启发家庭教育知识为宗旨”,同样设立了妇女识字班,不仅不收学费,而且课本费由馆内无偿提供,入学后成绩优异者酌情发放奖品^[61]。1936年1月5日,该识字班举行开学典礼,来报到的学生共有60

余人^[62]。

图书馆开设的妇女识字班充分体现了其无偿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使得不同社会阶层、经济状况的妇女,尤其是底层劳动妇女,得以突破经济与身份限制,获得平等的识字教育机会,较大地拓展了知识普及的覆盖面和妇女群体的受益范围。

除面向基础识字群体的识字班外,图书馆还开设了针对具备一定文化程度妇女的读书会。具有代表性的是浙江省立图书馆,其妇女读书会的成立目的是“提倡妇女读书”,凡品行端正、有读书趣旨、年龄在十六岁以上的妇女均可入会。会员的权利包括免费借阅新购的寻常图书、优惠购买新出版刊物、按期获赠非卖品刊物、寻求解答读书疑难、获得名誉或物质奖品等;应履行的义务包括每月每人至少介绍会员一人、按月填写读书成绩报告等;其开展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聘请读书会内外学者为本会指导员、聘请各界名人讲授读书方法^[63]。

妇女读书会具有较为明显的三个特征。第一是无偿性与开放性,妇女读书会不仅契合了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普及知识、服务大众的根本宗旨,更在妇女普遍缺乏教育资源的民国时期,成为思想启蒙的关键性举措。第二,无论是“推广妇女教育,弘扬地方文化”^[64],还是“引起读书兴趣及发展阅读能力”“增进妇女必要常识”^[65],都表明了妇女读书会教育方向的基础性与生活化定位。该定位区别于专业性学术研究,多聚焦于提升妇女的日常生活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如修身指导、阅读指导、卫生指导、家事指导、科学常识指导、抗战常识指导、职业指导^[65]等。第三,普遍注重可持续发展。如江苏省立南京民众图书馆妇女读书会初期招生困难,于是利用民校妇女班中一部分学生为“吸引剂”,不久参加者便与日俱增。其指导方案中明确规定“本会会员每学期每人至少须介绍二人入会,并须劝告家人戚友,时常来馆阅书”^[66]。又如上文已提及的浙江省立图书馆,也将“介绍他人入会”作为会员的重要义务,旨在通过成员的辐射作用,持续吸纳新成员,实质上是构建了一种基于人际网络的“裂变式”动员

方法,实现妇女知识普及与思想启蒙目标的持续推进。

3 民国时期图书馆妇女教育的影响

3.1 推动妇女解放

民国时期新旧思潮激荡,女性解放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议题被提上日程。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尚未完全瓦解、女性受教育权严重受限的背景下,图书馆超越了传统藏书机构的定位,成为实践性别平等理念的重要力量。它以知识传播为纽带,将个体启蒙与群体解放紧密相连,为长期被禁锢于家庭的女性打开大门。就如俄国妇女利用图书馆促进妇女解放运动^[67]一般,民国时期图书馆的妇女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播,更是妇女解放的推动力。

妇女图书馆为女性打造专属知识空间,不仅为女性提供了自主阅读平台,而且象征性地宣告女性拥有平等受教育权;妇女阅览室在图书馆中开辟女性专属空间,保障女性在公共空间的阅读尊严;妇女读物系统性地纳入平权理念、科学精神与生存技能,提供思想觉醒的武器;妇女识字班致力于扫除文盲,消除女性发展的一大障碍;妇女读书会提供的多元化指导,为女性争取独立与自主铺设了道路。可以说,图书馆从多维度为妇女提供知识和服务的同时,实质性地推动了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解放进程,赋予她们挑战性别桎梏的武器。

3.2 彰显并强化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社会教育机关协助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的训令》,提到图书馆应提供社会教育书籍及办理巡回文库^[68],将图书馆与民众教育馆、体育场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教育机关;1940年又发布《图书馆辅导办法》,指出“图书馆应以辅导各地社会教育机关图书教育为主要任务之一”^[69],从政府的立场确定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图书馆界多次探讨图书馆对社会教育发挥的作用,提出培养贫弱自学之人、增加读书兴趣和生活必需知识、助人

坚定意志、养成公民爱国思想、增进职业知识以及安慰心神等^[70],从图书馆界的立场宣扬图书馆对社会教育的全面性开展。

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教育同样依赖于图书馆。学校虽然历来都是最具代表性的教育场所,但图书馆与之相比,最为特殊的是其对无法接受学校教育的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影响。图书馆“多设简单之常识书籍,使已失学之识字妇女,自动读书,获得相当知识”^[71],从而“使她们无教师之指导得无限之智识”^[72]。因此,妇女教育不仅是图书馆承担社会教育使命的重要内容,也进一步凸显和强化了图书馆在近代中国社会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与独特作用。

3.3 促进儿童教育与代际传递

儿童被视为国家发展的未来和希望,儿童教育被赋予战略意义,除了学校教育外,家庭教育被普遍视为塑造儿童人格与智慧的核心场域,其中母亲发挥的作用尤为关键。民国学者认识到儿童教育与家庭中成人的学识是紧密相关的,为提升儿童智识,需要母亲担任引发儿童读书兴趣的职责,且还要为儿童挑选适合的读物^[73]。甚至有呼吁称“没有健全的母亲没有健全的国民,是以母亲要常常读书求科学知识”^[74],将妇女教育提升至事关国家命运的高度。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中枢机构,其妇女教育实践同样作用于儿童教育。如图书馆系统提供的家政、育儿、科学类读物,使母亲获得指导子女的知识储备,有利于避免传统经验式教养的局限。再如妇女读书会提供的阅读方法,帮助母亲角色的女性掌握阅读引导技巧,将图书馆资源转化为持续性的家庭内启蒙活动。

图书馆妇女教育除直接作用于养育、教导子女外,还发挥了代际传递的关键作用。儿童常通过观察成人行为建立学习范式,“儿童由于长时间的模仿,渐由反射的而变为自发的意识的,结果造成其受教育的可能性”^[75]。因此,母亲利用图书馆持续求知的实践即构成一种具体的教育示范,当子女们目睹母亲往返图书馆或阅读书籍时,

会逐步生成利用图书馆接受教育的认知。就如前文中杜定友强调的一般,通过母亲的力量将儿童引导至图书馆,推进其阅读能力的增长。

3.4 提升妇女参与社会的能力

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平台,在提升妇女知识水平的同时,也显著地培育了妇女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所必需的关键能力。首先,图书馆塑造了妇女的议事素养与批判思维。图书馆提供的是一种在公共空间进行的、自主性的学习体验,妇女在此接触到多元化的读物及观点。尤其是通过妇女读书会中的讨论、演讲等活动,训练“口头发表之能力”和“关于集会上应具之智识与技能”^[76],学习如何理性表述、逻辑论证与批判思考,有助于将妇女训练为能够进行独立思考、具备公共议事能力的现代公民。其次,图书馆增强了妇女的职业竞争力与社会适应力。通过提供实用型读物与举办读书活动,为妇女提供超越传统家政范畴的“职业技能之修习”^[24],这不仅使她们能更好地应对社会变迁,也为部分妇女争取经济独立创造了条件。最后,图书馆建立了妇女社会交往与组织协作的平台。如浙江省立图书馆要求妇女读书会的会员分享自己的读书笔记以促进会员之间相互学习;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员大会,并由会员大会推举产生委员会以主持日常事务^[63]等。妇女们在此与家庭以外的成员建立联系、共同学习,甚至在团体中担任职务,这锻炼了妇女的社会交往与组织协作能力,也是她们未来参与更广泛的活动乃至投身社会事业的重要积累。

结语

民国时期图书馆的妇女教育是近代中国社会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图书馆学人关于图书馆与妇女教育关系的理论指导下,通过建立妇女图书馆、开放妇女阅览室、筹备妇女读物、开展识字班与读书会等多元化举措,图书馆不仅形成了对学校教育的补充,更在传统性别秩序中开辟出女性专属的知识空间,将妇女群体纳入知

识接收主体范围。这一进程的影响在于:第一,图书馆成为妇女解放的推手,赋予其挑战性性别桎梏的知识积累;第二,妇女教育彰显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实现了其“指引民众之时代认识”^[77]等社会功能,从而强化了图书馆在社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第三,图书馆妇女教育提升女性知识水平,助力其引导子女启蒙求知,进而通过代际传递为儿童塑造知识获取方式的认知;第四,图书馆培养了妇女的议事素养、职业技能与社交协调能力,提升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综合能力。

民国时期图书馆虽然通过各种路径积极宣传并发展妇女教育,但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首先,在政治方面,民国前期军阀混战,各地政权将主要精力投入军事扩充与地盘争夺,无暇顾及文化教育事业的系统性规划;不仅国家资源被集中于军事,且较多图书馆也在战火中被日军焚烧、轰炸或占用,严重阻碍了图书馆的正常使用。其次,在经济方面,因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军费开支占比庞大,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投入极其不足。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经费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3%^[78];北伐成功后虽然有些许提升,但1939年后又始终在1%以下,最低时仅有0.14%^[79]。教育经费的捉襟见肘导致社会整体教育水平落后,也阻碍了图书馆的发展及教育职能的发挥。最后,在思想方面,虽然民国时期妇女地位较之前有了一定提高,但男尊女卑的观念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包括妇女自身在内的社会大众仍对“管理家务和养育子女是她们唯一职责”^[80]存在认同感。多重困难使得图书馆的妇女教育受到较多限制,效果也未如预期。尽管如此,其价值远非短期成效所能衡量,图书馆对于推进妇女教育的重要作用,不仅在当时得到了多重证明,也为当下提供了深刻启示。

参考文献

- 1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 吴黎平,译. 大连:新中国书局,1949:59.
- 2 马文珠,栗洪武. “男女平等”的中国实践路径——以陕甘宁边区乡村妇女教育为中心的

- 考察[J]. 教育学报, 2022(1): 196-208.
- 3 王国红. 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教育[J]. 江淮论坛, 2007(4): 168-172.
- 4 张玉龙. 中央苏区时期妇女教育略论[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7(12): 97-99.
- 5 王嘉, 吕君怡. 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报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百年回顾与现代回响[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13-22.
- 6 吴洪成, 张珍珍. 引领女学教育:《妇女杂志》的家政教育思想探析[J]. 教育学术月刊, 2021(9): 12-19.
- 7 路来庆, 路聪. 李大钊关于妇女教育的思想与实践[J]. 教育评论, 2010(2): 149-152.
- 8 李想. 论戴季陶的妇女教育观[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S2): 57-60.
- 9 崔洵, 张久珍. 刘国钧图书馆社会教育思想研究[J]. 图书馆杂志, 2023(2): 13-21.
- 10 杜定友, 朱秉国. 图书馆教育谈片[J]. 教育与社会(无锡), 1931(12): 5-6.
- 11 杜定友. 图书馆与女子职业[J]. 妇女杂志(上海), 1928, 14(4): 5-8.
- 12 杜定友. 妇女与图书馆事业[J]. 唯美, 1935(10): 3-4.
- 13 陈友松, 刘伍夫. 图书馆[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8.
- 14 佛里特尔. 图书馆员之训练[M]. 杨昭愬, 李燕亭,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64.
- 15 蒋镜寰. 图书馆与社会教育[J]. 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年刊, 1936: 1-4.
- 16 蒋镜寰. 图书馆之使命及其实施[M]. 苏州: 中央大学区立苏州图书馆, 1929: 7.
- 17 吴培元. 民众图书馆设施法[M]. 宜兴: 宜兴县立图书馆, 1930: 1.
- 18 繁灯. 妇女和读书的关系[N]. 盛京时报, 1938-10-28(5).
- 19 梁启超.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25, 1(1): 11-15.
- 20 因心. 妇女和图书馆[N]. 新闻报, 1933-12-27(15).
- 21 张劲我. 怎样普及妇女教育(续)[N]. 民国日报, 1929-04-19(16).
- 22 徐旭. 图书馆与民众教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1: 3-4.
- 23 徐旭. 民众图书馆实际问题[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5: 5.
- 24 妇女图书馆将成立发表缘起征求各界协助[N]. 神州日报, 1940-03-12(5).
- 25 津妇女协会成立[N]. 申报, 1928-09-13(8).
- 26 妇女协会之新事业[N]. 大公报(天津), 1928-10-01(5).
- 27 妇女协会筹设妇女图书馆[N]. 益世报(天津版), 1928-10-02(16).
- 28 妇协图书馆定期开幕[N]. 大公报(天津), 1928-11-01(5).
- 29 妇协图书阅览室展期开幕[N]. 大公报(天津), 1928-11-11(5).
- 30 妇女图书馆今晨九时开幕[N]. 大公报(天津), 1929-01-01(5).
- 31 妇协图书馆昨日开幕[N]. 大公报(天津), 1929-01-02(5).
- 32 上海妇女教育馆概况[M]. 上海: 上海妇女教育馆, 1935.
- 33 妇女图书馆新添大批图书[J]. 妇女月报, 1935, 1(4): 41-45.
- 34 妇馆妇女图书馆开始借书[J]. 妇女周报, 1937, 1(3): 4.
- 35 妇女图书馆改编图书目录[J]. 妇女月报, 1935, 1(8): 44-45.
- 36 上海妇女图书馆征求各界意见[N]. 新闻报, 1939-12-17(16).
- 37 妇女团体赞助组织妇女图书馆[N]. 总汇报, 1939-12-21(4).
- 38 上海妇女围筹备近讯[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40, 14(5): 17.
- 39 上海妇女围筹委会通过议案并决定馆址[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40, 14(6): 15.
- 40 昨日妇女界庆祝情绪振奋[N]. 申报, 1941-03-09(9).
- 41 筹备中之上海妇女图书馆[N]. 新闻报, 1940-04-23(12).
- 42 图书馆添辟女阅览室[N]. 民国日报, 1920-09-22(8).
- 43 湖南新设之图书馆 汉寿县立图书馆之盛况[N]. 时事新报(上海), 1923-08-25(1).

- 44 湖南省教育会图书馆请分润庚款陈述书[M].长沙:湖南省教育会图书馆,1925:3.
- 45 第一通俗图书馆拟扩充妇女儿童二部[N].益世报(天津版),1929-05-16(16).
- 46 教厅拟订方案整饬各县图书馆[N].西京日报,1934-09-03(7).
- 47 市立图书馆推行妇女阅书部[N].成都市政日报,1933-06-20(2).
- 48 图书馆行政[M].上海: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图书馆学科,[时间不详]:159.
- 49 卷头语[J].妇人画报,1933(1):1.
- 50 杜定友.普通图书馆图书选目[M].上海:中华书局,1935:33.
- 51 东方图书馆概况[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10.
- 52 苏州图书馆图书目录[M].苏州:苏州图书馆,1929:220.
- 53 浙省教育界庆祝三八妇女节[N].申报,1936-03-09(7).
- 54 活的民众图书馆设施法[M].南宁:广西省立民众教育馆研究部,1934:271-272.
- 55 稽天.虚设的女子阅书室[N].民国日报,1925-03-06(7).
- 56 虹.解放妇女最基本的活动就是推进妇女识字运动(续)[N].世界日报,1934-11-16(6).
- 57 市教育局广设识字班[N].世界日报,1929-10-17(5).
- 58 第一通俗图书馆妇女识字班招生[N].益世报(天津版),1935-11-26(9).
- 59 第一通俗图书馆妇女识字班招生[N].益世报(天津版),1937-02-16(9).
- 60 天津市河东地藏庵第四通俗团成立妇女识字班[J].天津市市立通俗图书馆月刊,1936,2(3-4):11.
- 61 天津第六通俗图书馆开办两识字班[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5,11(3):16-17.
- 62 妇女补习班开学盛况[J].天津市市立通俗图书馆月刊,1936,2(3-4):13-14.
- 63 浙江省立图书馆概况[M].杭州:浙江省立图书馆,1931:30-33.
- 64 县立图书馆组织妇女读书会[J].闽清教育通讯,1940,1(3):22.
- 65 湖南省立第二民众教育馆民众图书馆妇女读书会简章[J].民教之友,1939(2):15-16.
- 66 俞家齐.民众图书馆设施法[M].南京: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1934:142-149.
- 67 樊仲云.妇女解放史[M].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67.
- 68 蒋复璁.图书馆[M].南京:正中书局,1943:79.
- 69 教部公布图书馆辅导办法[N].申报,1940-01-11(7).
- 70 俞爽迷.图书馆与社会教育[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7,12(5):7-12.
- 71 康式如.普及女子教育之我见[N].晨报,1939-10-05(6).
- 72 我国农村妇女教育问题(续)[N].盛京时报,1925-03-14(7).
- 73 模范父母怎样使儿童的学识丰富[N].晨报,1940-07-04(5).
- 74 袁益和.母性应具有生理卫生常识[N].世界日报,1935-03-19(6).
- 75 叶馨生.儿童的模仿与教育[J].新儿童杂志,1935,1(1):73-77.
- 76 妇女读书会之进行(汉口)[N].民国日报,1922-03-19(8).
- 77 葆蒜.现代图书馆之职能及进展[J].中国新书月报,1932,2(7):1-5.
- 78 何云鹏.民国时期基层教育经费困境研究(1912-1937)[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24:8.
- 79 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2014年卷)[C].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658-688.
- 80 碧云.妇女读书问题之探讨[J].女青年月刊,1935,14(7):15-22.

(宋美锦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
2024级博士研究生,姚乐野 教授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收稿日期:2025-09-17